



V O L T A I R E ' S
C O C O N U T S

or Anglomania in Europe



伏尔泰的椰子

欧洲的英国文化热

Ian Buruma

[英] 伊恩·布鲁玛 著

刘雪岚 萧萍 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文化·生活·译丛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Ian Buruma

[英] 伊恩·布鲁玛 著

伏尔泰的椰子

欧洲的英国文化热

刘雪岚 萧萍 译

V O L T A I R E ' S

C O C O N U T S

or Anglomania in Europe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0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伏尔泰的椰子:欧洲的英国文化热 / (英) 布鲁玛著;
刘雪岚, 萧萍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2

(文化生活译丛)

ISBN 978 - 7 - 108 - 02610 - 1

I. 伏... II. ①布... ②刘... ③萧... III. 文化史 -
研究 - 英国 IV. K56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9230 号

责任编辑 冯金红

封面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图 字 01 - 2002 - 521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2.25

字 数 270 千字

印 数 0,001 - 8,000 册

定 价 25.00 元

伏尔泰的椰子

——兼评普世理想^①

(代译序)

陆建德

1726年5月，在国内不断惹祸的伏尔泰渡海进泰晤士河口，在格林尼治踏上英国国土。他与曾流亡法国的英国托利党政治家博林布鲁克^②相识，又持有当时英国驻法大使的介绍信，抵英后结交了不少名流与文人。伏尔泰两年多的旅英生活以及后来写下的有关英国的文字使他得到“亲英”的名声。他究竟赞赏英国社会的哪些方面？

也许英国人对商业的开明态度使他感佩。1733年，他在《奥赛罗》剧情的启发下创作了悲剧《扎伊尔》，并把它题赠给招待过他的英国商人佛科纳。他在献词上写道：

我把这部悲剧题赠给你，有如我题赠给同国的文人和知交

① 本文最初发表于2001年的《万象》杂志，后收入作者的《思想背后的利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这次又略作修改。

② 博林布鲁克（1678—1751），英国18世纪政治家兼风流才子，著有《论党争》、《英国史散论》、《爱国精神》与《爱国君王论》等著作，对18、19世纪的英美政治思想有较大影响。博林布鲁克能文善辩，气度轩昂。尽管有人说他才高德薄，他是英国18世纪上半叶最出众的公共人物之一。斯威夫特曾建议成立仿法兰西学院的机构，由博林布鲁克出任学院保护人。

一样。……同时我能够很高兴地告诉我的国人，你们用何种目光看待商人，在英国，对于光耀国家的职业，大家知道尊重。

同年问世的英文版《哲学通信》，直译应为《关于英国的通信》（*Letters Concerning the English Nation*，法文版 *Lettres Philosophiques* 晚一年出版）^①里有一封信专论商业。伏尔泰发现，“商业已使英国的公民富裕起来了，而且还帮助他们获得了自由，而这种自由又转过来扩张了商业；国家的威望就从这些方面形成壮大了。”看来商业的发达是与财产自由、人身自由和法治的精神相辅相成的。数十年后，伏尔泰在《关于百科全书的问题》（1771）“政府”条目第六节说到英国法律时突然发问：“为什么别的国家不采取这些法律呢？这样是否等于问为什么椰子在印度能成熟，在罗马就不会？”他本人对答案并非十分肯定，因而承认，英国法律有时难以奏效，产生这些法律需要时间，再说别国的仿效也未必成功。但是他的提议毫不含糊：这英国法律的椰子全世界都不妨“试种一下”。

二

伏尔泰的椰子是“理性”十字军征讨的战旗，它是启蒙哲学普世主义的特产，也是一本好书的题目。伏尔泰以及其他一些欧陆人士与英国的因缘、纠葛和嫌怨是伊恩·布鲁玛《伏尔泰的椰子——欧洲的英国文化热》（1999）一书的主要话题。友人于2000

① 中文版《哲学通信》（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系由上海外国语学院教学科学研究室根据法文版译出。

年夏天访游英伦，布鲁玛先生以此书相赠，笔者先睹为快。这位布鲁玛先生 1950 年生于荷兰海牙，父亲是荷兰人，母亲是英国人（外公外婆又是移居英国的德国犹太人），从小便有英国情结。英国是很多体育项目的发祥地，而板球是最能代表英格兰的运动。布鲁玛年幼时就加入了海牙板球俱乐部，也许是不自觉地借以获取一种文化身份的象征。俱乐部成员用黄黑两色的领带，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的丝质领带和羊毛长围巾，也是同样的颜色，成为他的最爱。那是一个以符号划定小圈子的复杂世界，聪明但又十分势利的海牙少年通过衣着用品和独特的色彩搭配“形塑”出英国味道十足的自我来。布鲁玛在莱登大学攻读中文后赴东京研究日本电影，后来相继担任《远东经济评论》和亲撒切尔夫人的《旁观者》杂志的记者，现任美国巴德学院（位于哈德逊河畔，离纽约不远）“人权与新闻学”讲席教授，常为《纽约书评》撰稿，该刊评哈金（金雪飞笔名）得奖小说《等待》的文章就是他写的。¹ 布鲁玛还受爱德华·萨义德启发，与人合著了《西方主义》（2004）一书，专门讲述西方如何在它敌人的笔下被程式化。

《伏尔泰的椰子》共十五章，第一章《丘吉尔的雪茄》带出作者的童年经历，纷纷登场的人物除了作者的一个个犹太先祖，还有伏尔泰、歌德、马志尼、赫尔岑、马克思、犹太复国运动的开山西奥多·赫茨尔、现代奥运会创始人顾拜旦、夏尔·莫拉斯、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德王威廉二世、德裔英国艺术史家佩夫斯纳（皇皇五十卷《英格兰建筑》的编撰者）、经济学家哈耶克等等，全书以《最后一个英国人》以赛亚·伯林（英国文化的犹太裔主保圣

1 他的近作《他们为什么恨日本》（载 2006 年 9 月 21 日《纽约书评》）为理解中日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人?)作结。书中既有欧洲旅英人士对英国的评论,又有莎士比亚、托马斯·阿诺德博士(19世纪拉格比公学的校长、《文化与无政府状态》^①一书作者马修·阿诺德之父)和名演员莱斯利·霍华德等英国人在欧陆的影响。书中不少内容涉及英国的习俗与法律,都是长中国读者见识的。作者征引宏富,夹叙夹议,自嘲中屡有新见。他指出,英国迷心目中的英国往往只是想象的产品,有了这句话,落笔就进退自如。

三

让我们先来看看伏尔泰如何“重商”。伏尔泰爱财,甚至贪财,他的商业头脑几乎发展为品德上的污点,绝非其他启蒙哲学家能比。他在1728年年底光景悄悄离开英国,原因不便深究。爱惹祸的未必尽英雄。1750年的伏尔泰已经屡次卷入丑闻,又为得不到路易十五宫廷礼遇暗暗苦恼,于是以56岁的高龄投奔普鲁士王腓特烈二世,做起廷臣来^②。他赶到柏林不久就搭上一位犹太人共谋发财之道,布卢姆斯伯里团体中的传记作家利顿·斯特雷奇说他“已有万贯家财,还抵挡不住一笔非法证券交易的诱惑”。^③后来两位合伙人失和,不得不打官司,犹太人输了,不过伏尔泰却有发假誓、伪造文件的嫌疑。他在宫中的形象也可想而知。撇开个人性格弱点不谈,伏尔泰陈说商业的好处是针对法国

① 三联书店2002年已出韩敏中译本。

② 腓特烈二世大约在几十年前就开始与伏尔泰用法文通信。两人书信往来几十年,腓特烈二世对他的这位哲学家导师的态度由极度的崇敬转变为轻慢的勉强容忍。

③ 《伏尔泰与腓特烈大帝》,载霍尔罗伊德与列维编《斯特雷奇读本》(牛津大学出版社,1980),第66页。

的现状而言，在他看来，英国勤劳的商人当然要比法国纨绔子弟和“在假发上敷粉”的贵族有用得多；再说经商致富也松动了英国的阶级结构，成功的商人能进入议会，成为社会的立法者。前面提及的商人佛科纳后来荣任英国驻土耳其大使，这是英国社会开放性的见证，但是他何以能得到这一职位？

伏尔泰旅居英国时正值博林布鲁克的政敌、辉格党党魁罗伯特·华尔浦尔主持国务，政治法度远不像他所写的那样清明。华尔浦尔知深有术，权变锋出，他与王室豪门形成财阀统治，腐败趋于制度化。在伏尔泰抵英那年，《格列佛游记》问世，斯威夫特在书中把阿谀逢迎之术比为在宫廷里的绳子上跳舞，谁有这罕见的本事，谁就能赢得赏赐。当时的官职爵位是利益的交易，受到博林布鲁克的一次次猛烈抨击。然而对贩官鬻爵的腐败行为，布鲁玛却以新自由主义的“宽容”写道：“地位和政治权力是流动的商品，从理论上说，而且实际上也往往如此，它们对那些出得起钱购买的人而言是开放的。”他说的是18世纪和19世纪，动词用的是过去式，但从全书倾向来判断，他对这现象叹美不置，因为它所反映的恰恰是所谓自然法则或自由（而非民主）宪章的本质。

盛赞商业的好处确实是18世纪初英国的特色。那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时代，笛福本人和他小说里那些充满活力的“创业者”不愧为时代的镜子。海外的机会展示了美好的新世界。散文家艾迪生1711年在《旁观者》日刊（第69期）的一篇文章里把伦敦交易所描写成“世界公民”友好交往的场所，他说英国不必扩展疆域就能以贸易为手段“增添一个帝国”。同一年，前途无限的南海公司成立，但就是这家公司，九年后暴露了过度的投机行为对社会整体的危害。

由于少数骗子（包括高官）的操纵和四处弥漫的歇斯底里发

财心态，南海公司的股票行市在 1720 年头八个月如同泡沫般越吹越大，泡沫破灭后股价狂泻，很多投资者损失巨大，有地产的郡中世家甚至不得不变卖不动产。剧作家约翰·盖依（他的《乞丐的歌剧》在 1727 年上演前送伏尔泰过目）在这次事件中也大伤元气，他在《寓言诗》中抱怨说：“骄傲的无赖分享南海的牺牲者，一天工夫像蘑菇般疯长。”1720 年年底，斯威夫特创作讽刺诗《泡沫》，他把南海公司的董事们比为口中不断叫“变！”的魔术师，吞食大鱼小鱼的鲸鱼，专在礁岩上抢夺沉船物资的“野蛮的一族”。整整一百年后，兰姆还在回忆南海公司的散文^①里提到当年“专吃公司账簿自肥的蠹虫”。英国政府见公众利益受损，迅速立案调查，继而严办涉案人员。史学家吉本的祖父是南海公司董事之一，他被课以相当于他资产十分之九以上的罚金。议会还在 1721 年通过《泡沫法》，法案规定，新的合股公司非经特准不得成立。该法案一个世纪后才被废除，虽然对老牌公司不起作用，但多少使那些想通过非法集资来聚敛财产的人不能得逞，从而维护了社会的秩序和稳定。英国政府近三百年前所体现出来的断然整顿市场的决心和保护普通投资者的能力，今天读来依然是让人感叹不已的。

商业给英国带来繁荣，在国际上却引起了争端。英国 18 世纪的战争大都具有商业目的，和约中往往有商业条款，如西班牙王位战（1701—1713）后签订的《乌得勒支和约》规定英国享有往西属美洲贩运黑奴的特权（拟定条约有博林布鲁克的功劳）。商业或重商主义未必就是“理性”的祝福，伏尔泰见不及此，情有可原。他介绍英国，吹捧英国，为的是针砭法国的时

① 即兰姆《伊利亚随笔》中的第一篇《南海大厦》。

弊，他的英国情结是为他的法国理想而生。英国在《哲学通信》里有时几乎像《老实人》中的黄金国。伏尔泰在第八封信里竟然表示，英国人爱护自己的自由，也爱护别人的自由；英国与路易十四作战不是要征服他人，而是要阻止人家来征服自由，“没有什么其他企图”。这些幼稚的语言太刺眼，被伏尔泰自己删去，不见于1739年以后的版本。法文版《哲学通信》编注者莱蒙·那芙（Raymond Naves）指出：“伏尔泰把那些骑士道德送给英国人，而这两大党（指托利党和辉格党）都不欢迎这些道德。”还是让19世纪英国自由党创始人之一帕默斯顿来给伏尔泰上一堂国际关系启蒙课，这位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的政治家无法忍受空洞美丽的辞藻，他说：“我们没有永久的盟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只有经常的、永久的利益，我们应当以这种利益为指针。”

四

布鲁玛引述了很多现在难以见到的有关英国的评论，他将焦点集中在“重商主义”、“贸易”、“自由”几个词汇上，一条连贯的脉络渐渐凸现。他在伏尔泰的英国、19世纪主张放任政策的曼彻斯特学派（自由派一支）、哈耶克的经济自由观和撒切尔夫人之间勾画出一条传统之线，并以此作为英国文化的主线。他还用了不少心思把英国文化与美国文化比为一对双胞胎，亲英就是亲美，反美等于反英^①；20世纪对美国商业精神和物质主义的鄙视

1 “美国化”一词在英文里带有贬义。《牛津大辞典》（OED）所收该词第一条例句取自1860年的《泰晤士报》：“美国化在此表现为极大的灾难。”英国文化界很多人士抵制美国的影响，以布鲁玛的逻辑，他们属于反英分子。

乃是 19 世纪（如歌德、海涅等欧陆人士）对英国市俗的批判的翻版。以生花之笔（例如“盎格鲁—撒克逊价值观”之类的模糊表述）淡化英美之间的差异和冲突在强调两国“特殊关系”的时候自有其地缘政治的需要。作者请伏尔泰为中介来完成自由观念跨越大西洋的传承。1778 年伏尔泰回到阔别 28 年的巴黎，富兰克林请他为自己八岁的孙子祝福，伏尔泰用英文说了“God and Liberty.”（上帝与自由）。作者言简意赅地归纳道：“种子就这样播下了。”这是什么种子？英国式的自由经伏尔泰倡导在美洲生根开花？当时已宣布独立的北美各州还在与英国交战，富兰克林出使法国的任务是尽可能从波旁王朝的“旧制度”得到足够的经济与军事援助来打败“自由的”英国。这场战争是典型的利益之战。

“历史学终究只是我们对死人所玩弄的一套把戏罢了。”留下这句名言的伏尔泰本人也会不幸成为后人玩弄的对象，随叫随到的传声筒。伏尔泰像亚里士多德那样推崇混合政体，他欣赏英国的政体，因为“英国政府保存了专制政体中有用的部分和一个共和国所必需的部分”。后世建立在普选基础上的代议制是他无法设想的。他崇拜路易十四这位“有意为善的专制君王”，并称路易十四对文化艺术的奖挹为“不朽盛业”。^①他对英国的复杂性慢慢有所察觉，诚如那芙所言，他不是要用一个有缺点的（英国）文化来替代另一个可能有优点的（法国）文化。1745 年法军在丰特努瓦战役中大败英军，身为宫廷史官的伏尔泰还写了颂歌。伏尔泰

① 关于伏尔泰对路易十四的盛赞，见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吴模信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 年。伏尔泰在《哲学通信》的第 20、21、23 封信里谈到英国“研究文学的老爷们”、擅长诗文的英国贵族和社会对文人的尊敬（如艾迪生曾任副国务大臣）。这些布魯瑪都略去不谈，大概担心分散读者对英国重商传统的注意。

是天才，而天才有好几个不同面目，像孩子一般善变。除了英国法律外，伏尔泰还对中国儒家文化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称中国的“伦理道德和治国之道天下首屈一指”，把他引为外援倒是大可不必的。

在某种程度上伏尔泰是布鲁玛的外援。他被打扮为早期资本主义的旗手，商业精神和自由理念的吹鼓手，变得与他的同时代人、那位从荷兰移居英国的曼德维尔医生最为相近。曼德维尔在《蜜蜂寓言》一书里提出追逐私利乃公共利益的保障，这妙论在两百多年后依然深得某些怀旧者之心。哈耶克理想中反对任何形式中央集权的“自由社会”在二战后欧美各国看来都是乌托邦，社会福利的推行、政府开支的相应增长和统筹全球的环保协议的实施已不可能彻底逆转。在国际组织会议上和贸易谈判中，反复强调的劳工权利和环境标准不是市场的产物，而是政府和各种社会力量干预经济的结果。布鲁玛支持欧盟，也主张英国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欧洲事务，但他在书中从不放过敲打德国的机会，因为德国对现代世界的重大贡献（如福利社会的理念以及对政府功能的理解）有悖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原则。

五

不同的人发明不同的英国。伏尔泰赞赏的英国是斯威夫特、蒲柏和菲尔丁嘲骂的英国，曼彻斯特学派看重的英国是卡莱尔、纽曼、罗斯金、阿诺德和莫里斯等维多利亚时期文化巨人痛斥的英国。在法国大革命中被枭首的罗兰夫人临死前感叹：“自由啊，多少罪行假汝之名以行！”我们还可以在“自由”后面加

上“贸易”一词。现在，即使是自由派史学家也认识到，19世纪的“自由贸易”直接引发的一些“最臭名昭著的事件”不是偶发的地方危机，它们是深思熟虑的、一贯的政策的结果。王尔德在19世纪末说，曼彻斯特学派“把美好的世界降为买卖双方的市场，他们求助于人类最低级的本能，他们失败了，战争迭起”。假如换一个中国的视角，我们又会发现，一位沉浸于19世纪英国文化的中国人用教义问答的形式将英国非利士人贸易宗教的信条概括得十分巧妙：

何为极恶？——妨碍大英帝国的贸易。

上帝创造四亿中国人的动机何在？——为英国发展贸易。^①

王尔德所说的“人类最低级的本能”在布鲁玛的这部著作中恢复了名誉，它就是“追求私人利益”，它就是“经济人”的本性。布鲁玛找了恶人希特勒来咒骂“追求私人利益”，于是肯定自利的哈耶克必然站在真理和美德一边。不知不觉之间一大批文化界杰出人士居然被扫入希特勒的营垒。我们不妨略述他们的言论。法国共和派政治家、律师赖德律-洛兰1848年参与革命，翌年逃亡英国，但他却在《英国的衰落》（1850）里把英国描写成极端自私、与民主共和的理想水火不容的国家，其所谓集会言论自由徒有其表，英国人最关心的无非是“它值多少钱？”。德国作家冯塔纳则在《伦敦的夏天》（1854）里指责英国人“崇拜金牛

① 李鸿铭：《中国人的精神》（英文），黄光涛、宋小庆译，海南出版社，1996年，第114页至115页。

悛”；他还有独到的见解：民权在英国得到保护，但整个社会虚荣势利，绝无民主精神。传播英国式园林艺术的普鲁士贵族赫尔曼·冯·皮克勒－穆什考在他的访英观感《死者来信》（1830）里叙述道，伦敦交易所的建筑风格令人敬仰，不过交易所里摩肩接踵的却是“一群焦灼不安的受诅咒的家伙”，“私利和贪婪在每双眼睛里闪耀”。所谓的右翼作家夏尔·莫拉斯在大英博物馆看到被掠夺到英国的希腊雕塑后愤怒地发问：“是哪一个邪恶的神明，或者是什么样的不幸命运，将这个身上流淌着我们血液的年轻人，带到了这片灰暗潮湿的天空下？”布鲁玛风度翩翩地转述对英国的严厉批评，不多纠缠，仿佛它们都是狂言谵语。当然，对英国非利士人最激烈的抨击还是来自英国内部，比如马修·阿诺德的经典之作《文化与无政府状态》。

阿诺德是广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但他被排除在布鲁玛精选的自由主义俱乐部之外，可见这俱乐部的成员资格还有待认证。布鲁玛引用哈耶克说，反犹主义（反高利贷为其症状之一）和反资本主义同出一源。为古典资本主义申辩的时候，布鲁玛总想把它对立面与最丑恶、最不可理喻的思潮挂钩，这策略在本书中使用过多，令人想到讼师笔法。布鲁玛未曾想到伏尔泰的椰子还是“反犹”的椰子。启蒙哲学家对基督教的重新评价往往包含了对《旧约》中记述的犹太人历史和神话的谴责，伏尔泰在《哲学辞典》和《风俗论》里不放过一切机会攻击犹太人的宗教与习俗，他在这方面走得比时人更远。如果哈耶克的立论成立，那么伏尔泰反犹就必然反资，应该被清除出资本主义的先贤祠。另一位自由主义俱乐部成员、“最后一个英国人”伯林与哈耶克也不大相投，他曾揶揄地说，华尔街在哈耶克的学说里勘探到高品位的金矿。伯林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他利用德国浪漫派作家赫尔德

的“民族”(Volk)概念支持犹太复国的主张。不过赫尔德在本书中却像一个自由派的夙敌。伯林最敬仰的思想家是俄国作家、社会活动家赫尔岑，而赫尔岑在流放英国期间对罗伯特·欧文的社会主义实验深感兴趣，他与主张放任政策的曼彻斯特学派势不两立。在布鲁玛笔下，赫尔岑也是以“亲英派”出现的，但赫尔岑却在《往事与随想》中嘲笑了英国的经济自由主义：“政府竭力避免干涉的嫌疑，以至听任人们每天饿死，也不敢限制济贫院的自治权，还可以允许整个村子的人民在劳动中累死，或者变成呆小病患者。”^①关于政府的干预他还有惊人之见：

一个国家，政府的干预越少，言论和精神独立的权利越能得到承认，民众也越是不能容忍异己，公共舆论也越是带有强制作用；你的邻居，你的肉商，你的裁缝、家庭、俱乐部和教区，都随时在监视着你，对你履行着警察的职责。^②

也就是说，自由的制度有可能扼杀无数思想家向往的精神自由的境界。当人民自己在行使专制权力^③的时候，整个社会都自觉地与舆论大致保持一致，于是就出现顺民(conformists)和

① 赫尔岑：《往事与随想》，项星耀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下卷，第313页。

② 赫尔岑：《往事与随想》，第244页。赫尔岑谴责暴政，但却注意到“政治上受奴役的欧洲大陆，精神上却比英国自由”。《往事与随想》，第233页。

③ 笔者一位自由派朋友在英国求学时喜欢与英国人谈论政治，后去美国新英格兰一大学工作，旧习不改。由于他在美国同事面前表示对美国外交政策不满，有人在他信箱里塞了一张纸条，上面打着三个英文词：“Communist, go home.”难怪赫尔岑以鄙视的口吻说：“在一个保存着清教徒和公谊会排斥异己传统的国家里，教育和良心的自由能达到多高的水平呢！”《往事与随想》，下卷，第244页。

梭罗所说的“舆论的奴隶”。这样的现象，究竟在何种社会更为普遍？^①

六

布鲁玛心仪的英国是多层面的英国，这些层面有时并不能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取该词在19世纪英国的含义）框架内形成和谐的整体。他小时候的一位同学被父母送到一家英国寄宿学校就读，他从寄宿学校联想到英国的公学，羡慕不已。布鲁玛在《学校生活》一章写道：“英国公学深得亲英人士喜爱，它们比议会、证券交易所和习惯法更能代表亲英人士心目中的英国。”善哉斯言。

著名作家马尔罗曾在戴高乐政府任文化部长长达十年之久。他在1974年接待来访的《英国游记》作者布鲁斯·查特温时谈及当时西方所面临的重大危机。他说，当今世上最需要的莫过于对人自身的改造，古罗马人之所以能在数世纪的时间里统治如此广袤的疆域，全靠罗马造就了大批优秀的领导人才。马尔罗认为，苏联人在这方面未能成功（美国人更不必说了），在近现代，只有英国人能像罗马人那样培养出一个精英阶层，它不是贵族，也不是中世纪的骑士，而是绅士；英国绅士不愧为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而英国公学是英国绅士的摇篮。

英国公学像小型的国家，在等级次序森严的公学成长意味着

① 比较恩格斯评卡莱尔：“社会偏见的统治在任何地方都是所谓自由政治制度的第一个后果，而这种统治在政治上最自由的欧洲国家英国比在其他任何国家都要严重……英国人屈服于社会偏见，每天为它牺牲。”见《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2卷，第195页。笔者只是希望读者注意这一悖论，绝对无意为任何压制言论和出版自由的举措辩解。我国一般读书人都知道马克思谴责普鲁士审查制度的文章。

学会顺从与领导，明确责任与特权。公学的主要任务与其说是教书，还不如说是育人。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上半叶，英国公学学生是社会乃至大英帝国的栋梁，他们的举止言谈和精神气质无形中成为英国绅士的原型特征。公学已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但它们的办学特点一直到 19 世纪中期才给人留下系统的印象。马修·阿诺德之父托马斯·阿诺德博士任拉格比公学校长期间（1828—1842）使该校成为公学的样板，在学校新哥特式的回廊里，秩序、权威和传统被奉为神圣。从此公学学生以遵守纪律、富有公民责任感、热心服务社会和积极参加体育运动著称。托马斯·休斯的半自传体小说《汤姆·布朗的学校生活》是拉格比生活的生动写照，该书 1857 年出版，到 1890 年重印已达五十次之多，为维多利亚时期最受欢迎的图书之一。布鲁玛自称从小就迷恋上这部小说，他还细细琢磨公学学生间的种种规矩并模仿他们的语言。

拉格比公学还是英式橄榄球的发源地。当年阿诺德博士提倡“体魄强健的基督教”，一边向学生灌输基督教伦理观，一边鼓励他们通过体育活动培养勇敢、公道、忠诚和团队精神等优秀品质。奥运会的恢复也有他的一份功劳。在英国公学广泛开展的体育运动中，参加者精诚团结，各尽其力，“费厄泼赖”的精神焕然一新，这使现代奥运之父顾拜旦深深感动。顾拜旦也是《伏尔泰的椰子》一书中的亲英人士，他在 1883 年访问拉格比公学时，见到该校教堂地面上阿诺德博士朴素的墓石，不能自持，竟跪在地上向这位英国国教牧师兼教育家致敬。奥运的精神是爱的精神（在英文和法文里“业余爱好者”叫 amateur，该词来源于拉丁动词“爱”，amo），可惜一百年后的奥运会已被职业化、赏金和“金牌战略”彻底败坏。还要多少个艾冬梅、多少双伤残的脚，有关公共部门才会警醒？